

---

#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

容 应 萁

---

过去的研究认为，自立军起义是康梁一派单独主持的唯一一次武装起义。但是近年来，由于《井上雅二日记》及新加坡丘菽园家所藏资料等新史料的发现，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重作探讨，指出孙中山一派和这次起义有很大关系。再者，在康梁的武装起义计划中，长江流域只是其中一部分。本文通过探讨容闳和自立军起义的关系，说明这次起义是各派联合行动的结果。

## 一、孙中山、容闳、容星桥

过去的研究认为，孙中山和容闳首次会面，是在1900年9月1日从上海出港的神户丸号客轮上，两人同抵日本长崎后，又一同前往东京，并于9月7日访问了犬养毅，在那里和内田良平、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原楨等进行了会谈。详细查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等资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和容闳确是同乘神户丸号于9月3日抵长崎。当夜，孙又到容下榻的旅馆和他详谈。4日，孙离开长崎往东京前又访问了容闳。但是，容闳并没有和孙中山一同赴东京，而是继续留在长崎，7日才离开长崎往香港<sup>①</sup>。和孙中山一同往东京并访问犬养毅的并非容闳，而是容闳的堂弟容星桥<sup>②</sup>。

容星桥于1865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874年被选为第三批留美幼童，由容闳带赴美国，1881年清政府召还留美幼童时回国，被分派到天津海军学堂。他是120名留美幼童中唯一参加革命的人。他认为容闳是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因此对之非常尊敬。

---

① 《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以下略称为《支那之部》），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知事发，电受第428号及高秘第329号；明治33年9月7日长崎县知事发，高秘第336号。

② 《支那之部》，明治33年9月10日警视总监发，甲秘第111号。

至于容星桥和孙中山的关系，则要从居住香港的关元昌（1832—1912）一族说起。关元昌的父亲是基督徒，关家和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关系密切。元昌之弟节堂是该会理雅各（James Legge）牧师的学生，后来任该会长老。元昌则从一美国医生习牙医，开中国牙医医学的先河。他同时又热心教会工作，深受理雅各等人信赖，担任伦敦传道会广州及香港分会的长老。

元昌夫妇生有十男五女，七男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班同学。孙中山居港时经常出入关家，他尊元昌夫妇为义父母。关家五女月屏和第二届留美幼童温秉忠结婚，经温的介绍，容星桥和关家八女月英于1891年结婚，孙中山参加了婚礼。关家子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但一直热心于社会改革。而且，十二男景星之妻是四大寇之一杨鹤龄的妹妹，孙中山在澳门创办中西医院向镜湖医院借款的担保人吴节薇是杨鹤龄的另一个妹夫。总而言之，香港、澳门，甚至包括广州的受过西洋教育的人，一般来说都有着血缘、地缘、社会、文化、宗教等背景上的联系。

容星桥婚后任职于汉口俄国顺丰茶行，经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香港，1895年在香港参加兴中会，1899年，孙中山任命他为兴汉会湘汉负责人，参与自立军起义计划，1900年8月事败，唐才常、林圭等人被张之洞处死，容星桥化装成苦力乘船逃往上海，9月1日与孙中山、容闳同船赴日，9月18日经长崎返香港。在香港他再次进入商界，任《中国日报》印刷事务总理，后任新大百货公司司理等，再没有活跃于革命舞台。但1905年，他和陈少白等旧兴中会会员同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又担任筹款委员，在财政方面对革命派有所贡献。1922年7月陈炯明叛乱之际，孙中山任命他为“筹饷委员”。容星桥和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关系，直至1933年逝世。

## 二、从井上雅二日记<sup>①</sup>看容闳和自立会

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在8月1日的日记中，首次提到他和容闳的会面。无论这是否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面，井上此前当然知道中国国会会长容闳这个人。时值北方义和团起义，在以日本利益优先的“支那保全”宗旨下，东亚同文会在上海的活动有两项方针：1. 与南方督抚及民间志士联合成立新政府；2. 若南方督抚也参加排外行动，则与民间志士携手建设新政府。因此，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和干事井上雅二，一方面和上海士绅阶层代表汪康年、文廷式往来频繁，另一方面和湖南维新派唐才常以及在上海与唐一起活动的狄平非常接近。从7月26日及31日的日记中，可见井上对汪、唐两派联合成立的中国国会抱极大的期望，但在31日的日记中，他又分析汪、唐的关系，认为两人其实不和，唐觉得汪不可恃，汪则认为唐有野心。而

<sup>①</sup> 近藤邦康解题，近藤、藤井友子校订《井上雅二日记》，《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

且汪似乎不知道自立会的内情，容闳则知道。井上认为，自立会和中国国会事实上是一致的，已拥有数万名同志<sup>①</sup>。1899年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是以联合爱国忠君的仁人志士为宗旨，因而会员包括上海的开明绅士（如汪康年），以及会党首领。但在1900年5月开始为人所知的自立会则是以招致长江一带的兵官及哥老会为宗旨。如果像井上所说汪并不知道自立会内情的话，则自立会并非只是由正气会更名而成的，而是另有新的目的。至于中国国会和自立会虽然表面上一致，但在唐才常的计划中，两者的任务并不相同。井上在和容闳见面翌日，又提到容和汪康年也不和，容认为汪有私心。井上还指出，汪的朋友中缺少决死之士。井上的日记说明，容闳和唐才常的关系较为接近，并暗示唐的朋友中有决死之士。所谓决死之士，很可能就是指参加举兵起义的人。

容闳一生似乎没有什么日本朋友，不过他在这个时期却和井上于8月1日、6日、8日、9日频频会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8日的日记中称“明早10时预定和唐才常同访容闳商谈。明日和唐才常一同溯航长江”。唐才常8月9日离开上海正是为了前往汉口参与自立军起义，而在出发当天，三人仍相约见面，说明三人尽管各自立场可能不同，但都和这次举兵计划有密切关系。9日因为唐事忙，由张通典陪同井上往见容闳<sup>②</sup>。是夜唐和井上离开上海，11日抵南京，井上登岸。他在南京的任务就是和民间绅士、官员相约为中国国会协力，而与武官则相约为自立会尽力，也就是说，同时联合南京的文武官绅，以应举事之需<sup>③</sup>。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国会及自立会的差别：前者是文官及绅士的集合，后者则是由武人及其他“胆大的豪杰”组成。20日，井上完成任务回到上海，当天便和容闳会面。由此可见，对井上来说，唐才常和容闳都是他争取的对象。他还认为，即使在缺少胆大豪杰的文官之中，只要时局有进展，也会有人赞同他的计划。

井上和容闳的关系发生变化，是在22日收到汉口来电，告之“昨夜，唐才常及其一派，另甲斐靖同被捕”之后<sup>④</sup>。井上立刻为营救唐才常奔走，但23日便接到唐已被处刑的电报，和唐关系不浅的他悲痛不已<sup>⑤</sup>。24日，他往见容闳，欲知道容闳对此事的反应，容闳却说：“此事与我等无关”。井上在日记中叹道：“如此支那人根性”，表现出他的灰心沮丧。井上一直以为，容闳知道唐才常的举兵起义计划，岂料一旦事发，容闳竟然毫不关心。于是井上在26日的日记中作出以下结论：容闳身为中国国会会长，其实并不知道唐的事，一切均由康有为等安排。对于中国国会的失败，他在8月29日写的东亚同文会报告中表示：唐、汪两派一开始便有阻隔，加以筹饷失败，现在唐一死，国会唯有告终<sup>⑥</sup>。

<sup>①②③④⑤</sup> 《井上雅二日记》，第160、165、167、169、172页。

<sup>⑥</sup> 井上雅二：《维新党の失败と其将来》，第17页。

但是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如井上所推断，容闳和汪康年一派同样不了解自立会的实际情形以及唐才常的举兵计划？容闳出任中国国会会长，很有可能确是因为康有为等要利用容闳的地位而作此安排。此外，国会的中心人物是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开明官绅，无论是地缘关系，或是出身背景，他们均和容闳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容闳事事偏袒唐才常，更使他和汪不和。容闳的会长地位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另一方面，唐才常之所以要在正气会之外又另组自立会，可以从井上的东亚同文会报告中得到答案。井上认为汪康年终究非谋反之人，而自立会却是和康梁通声气，又得容闳赞同，目的是联络及利用长江一带的兵官及哥老会<sup>①</sup>。即是说唐才常意在举兵，但他明知汪等人不可能同意，因此另兴新组织。那么，容闳是否只是赞同自立会的存在却不清楚其真正宗旨呢？

容闳自变法运动以来一直和康梁保持密切关系。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相继逃亡日本，容闳亦从北京迁居上海租界。梁启超抵日后不久，即于10月26日、27日告知志贺重昂，容闳将来日本陪同康有为赴英美<sup>②</sup>。虽然容闳没有赴日，但他于1900年3月末到新加坡和康有为商讨起义事宜，又向当地警察询问英国政府支持三个月后举行的维新派武装起义的可能性。4月4日，容闳从香港起程去美国。可是当时在檀香山居留的梁启超对容闳在这个时候赴美表示反对。但梁在获悉容已赴美后，4月29日给康的信则道：“纯老来美，大善，可以为各处保皇会增力。弟子前信因以日内大事在即，夫子左右不可无一通西语之人，故阻其行。今见此次来书大约去事尚远，能抽暇一来最妙也。”<sup>③</sup>容闳在新加坡以及梁启超在信中谈到的起义及大事，当然是指康梁一直在筹划的广东地区与长江流域的举兵。

明白了容闳和康梁的关系，应该说容闳没有可能不清楚自立会的内情及唐才常的举兵计划，他更不会对唐才常被处死刑毫不关心。然则容闳因何在井上面前表现出一副完全与己无关的态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不但不是和自立会起义无关，而是关系实在太深，正在苦虑各种善后对策之际，见到并不完全信任的井上，那就唯有装作没有关系了。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容星桥在汉口参与自立军起义计划，事败化装乘船逃到上海，在上海接他的便是容闳。

### 三、“借勤王以兴民政”：孙、梁的折衷点

1897年8月孙中山开始居留日本。1898年9月、10月梁启超康有为相继流亡日本。康有为抵达东京翌日，孙中山便托一道在香港安排康赴日的宫崎滔天介绍他和康

<sup>①</sup> 井上雅二：《维新党の失敗と其将来》，第16页。

<sup>②③</sup>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231页。

见面。康有为以深受光绪皇恩之身，拒见孙中山。此后，日本人士多方面努力，希望促成孙康合作，但康一味拒绝。孙中山当时仍是无名之辈，和孙相比，康有为不但是进士，文名满天下，又是变法运动的发动人，无论是地位还是经历，孙中山和康有为都相差太远。因此，虽然两人都抱着改革中国的共同目标，康有为却完全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尽管如此，孙中山仍切望和康合作。对孙中山而言，康有为的名气，以及他筹办款项的能力，都是极其重要的。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与孙合作问题上表现得比较通融。梁本来就因为十分尊敬日本的幕末志士吉田松阴与高杉晋作，以致给自己起一个“吉田晋”的日文名字。有人批判戊戌变法因为太急进而失败，梁则引用松阴之言“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sup>①</sup>，进行反驳。因此他和孙中山实有意气相投之处。他曾道：“中山与我甚厚，在横滨有一短时期，每宵共榻”<sup>②</sup>。即使在自立军起义事发之后，梁在上海对井上谈及孙，仍称他有“才力之人”<sup>③</sup>。因此，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赴加拿大之后，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日益接近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并非说明两人的思想再无分渠，而是两人都比较正视现实，思想灵活，能够接受其他变通方法，因此可以携手合作。

在改革中国的大前提下各派携手联合这种主张是一直就存在的。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成立，就是孙中山兴中会一派和一向主张“热爱祖国”的杨衢云、谢纘泰的辅文学社一派联合的结果<sup>④</sup>。1896年10月谢纘泰往见康有为，谈到“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康同意他的意见。1897年谢与康广仁密谈。康广仁提议召集两党上层人士，商议有关合作问题，但他批评孙中山“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表示不愿意和“轻率鲁莽”的孙联合。康广仁并否认他和康有为是亲满，称他们是要为中国人的利益进行一次和平革命<sup>⑤</sup>。由此可见，康有为兄弟亦非绝对反对和其他派别合作，只是拒绝孙中山个人。对同属兴中会的谢纘泰，他们反而表示好感。

1898年3月，杨衢云赴日本与孙中山磋商有关各党派及秘密团体合作事宜。同年11月，杨自横滨致函谢纘泰，说已和湖南维新派取得合作，只是“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sup>⑥</sup>。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和康、梁等人都在日本，唐才常也于10月到12月间去了上海、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因此，这封信中所指的湖南维新派应该是唐才常。杨虽已和唐派个别成员取得合作，但对两派全体的联合并不乐观。1899年4月，杨一度表示康派答应合作，到6月却又说梁启超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47—148页。

② 吴天任：《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1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41页。

③ 《井上雅二日记》，第170页。

④ ⑤ ⑥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293、296—299、302—303页。

不愿意合作<sup>①</sup>。杨对谢说：“康有为党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西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sup>②</sup>。

“自利和妒忌”不只存在于康孙两派之间，各派内部亦有分歧。兴中会内杨衢云、谢纘泰一派和孙中山一派一直有领导权之争。初时杨当选会长，到1899年10月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联合成兴汉会孙中山被选为会长时，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个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才确立了孙在兴中会的领导地位。同样，康有为一派内也有矛盾。最高领导人康有为虽然极力反对和孙合作，梁启超和唐才常却着眼于和孙合作的有利之处。1899年9月，唐再度离开上海出游香港、南洋、日本，在日本和孙、梁相见，年底或1900年初在香港见康有为。唐的目的是要争取孙、康联合支持他的汉口举兵计划。康有为仍然坚持拒绝和孙合作，但从梁启超后来的行动可知他对此计划十分积极。孙中山亦同意合作。1899年11月，林圭为响应唐才常从东京回国时，孙介绍在汉口的俄国顺丰洋行作事的容星桥协助他工作。

孙中山同意协助林圭，并不等于兴中会与保皇会全面合作。兴中会和保皇会在宗旨及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孙曾对唐才常说，只有康有为放弃保皇，两派才能联合，如此，他亦愿意尊康为首领<sup>③</sup>。无论怎样需要康的名气及军资的协助，放弃保皇，这是主张光复汉民族的孙中山最低限度的防线。为了说服孙中山，梁启超于4月28日自檀香山致函孙，提议：“借勤王以兴民政”，“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梁还提议，事成后“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sup>④</sup>。

以往的研究指出这封信导致孙梁正式决裂，因为他们之间再无可以妥协之处。可是如果详细分析孙梁此后的行动，却应该得出孙中山被梁启超的这封信说服的结论。梁以前对孙中山说明立场时曾道：“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sup>⑤</sup>。而孙中山的一生，也在方法及战略上多次表现“随时变通”。再者，下列三点可以证明在梁启超的这封信后，孙梁正式联合。

第一，同年6月，孙中山为了要与滞留新加坡的康有为商议合作，派宫崎滔天、内田良平、清藤幸四郎往见康。孙中山甚至表示，若能在该地筹备军资则暂时留下，否则立即前往广东。如果孙梁正式决裂，孙中山应该不会对康有为有这样的期待；倘若说孙梁之间已达到某种程度的了解和默契则比较合理。可是康有为把滔天一行视作李

① ②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303页。

③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77页。

④ ⑤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181页。

鸿章派来的刺客，向新加坡政府密告，以致滔天及清藤被捕，这次合作又告失败<sup>①</sup>。

第二，同年7月17日，梁启超由檀香山出发经日本回国，在给孙中山胞兄、檀香山兴中会负责人孙眉的信中写道：“接有新加坡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弟看此情形，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决于明日搭日本丸东返”<sup>②</sup>。信中没有写明起义地点，但从时间来看应是指自立军的举兵。这封信证实了梁启超和孙眉在檀香山的密切关系。

第三，梁启超于8月19日从神户赴上海之后，孙中山则于8月22日由横滨出发往上海。据井上的观察，两人在出发前曾在东京会面<sup>③</sup>。这一次孙赴上海的目的，一般的说法是他要和刘学询商讨有关李鸿章的两广独立计划。可是出发前孙曾发表以下谈话：“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我这次回国，毫不担心会遇到危险。我的归国一事，将会得到日本领事和另一国领事的间接保护。加以北京正处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更可放心。依我看来，梁启超的决定回国，也是有鉴于此的”<sup>④</sup>。这篇谈话的内容再加上上述4月28日梁给孙中山的信内“我辈握手共入中原”<sup>⑤</sup>一句，可见两人在这时期的返国应非偶然的一致，而是有计划的行动。此外，汉口领事的秘密报告内有孙中山请神户丸号船长代为保存军资一万五千元之说<sup>⑥</sup>。另8月30日广岛县知事给外务省的电报，言及玄洋社的三角茂喜等人多方设法赴中国，其目的是在上海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会合，挽救康派危机，再密谋在清国举事<sup>⑦</sup>。从各种资料判断，孙、梁的回国，是在北方义和团起义，上海中国国会成立，长江流域以及两广举兵时机成熟等条件下的一次有计划的联合行动。

#### 四、参与自立军联合的各派

曾经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当教师，又曾协助康有为亡命日本，之后又参加唐才常的活动的田野橘次著有《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sup>⑧</sup>。田野在书中说，他难以确定唐才

① 详见《三十三年之梦》，第257—299页。

② ⑤ 《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433页。

③ 《井上雅二日记》，第170页。

④ 《支那之部》明治33年8月22日神奈川县知事发，秘甲第334号；《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8—199页。

⑥ 《支那之部》明治33年9月12日汉口领事濂川浅之进发，机密第40号。

⑦ 《支那之部》明治33年8月30日广岛县知事发。

⑧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年版，本文转引自《自立会史料集》。

常到底属于哪一派。唐和康友善，所以有人说他是康派，而唐曾为哥老会会员，所以又有人称之为哥老会成员，不过田野断定唐才常不是兴中会会员。唐才常背景复杂，他确实比较接近康梁，但却不能完全把他视为康的门生或部下。他不是兴中会员，但在日本和孙中山见面并订下“殊途同归”之约。此外，他和日本的关系也很深。他有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视日本为中国改革的模范，认为湖南可以扮演和萨摩同样的角色，戊戌变法前，他的文章已表现出对日本有相当好感，而他亦和田野及东亚同文会的会员等日本人交友。1899年11月，他开始实行举事计划，以开学校及设新闻社等名目派遣田野、林圭等六人到长沙，拟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但他的湖南计划因受上海的日本三愚物<sup>①</sup>反对而受挫。于是唐改变战略，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以团结爱国忠君的仁人君子；而派林圭在汉口联络哥老会。林圭得兴中会员毕永年及容星桥之助进行活动。

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与唐才常、林圭素有交情，和当地会党亦有密切关系。他在日本参加兴中会，据说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会见的也是他。香港成立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会长，亦是以为毕为中心活动的结果。容星桥则以洋行买办身份作掩护，经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香港各地。孙中山一方面把容星桥介绍给林圭，另一方面委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sup>②</sup>。这表明孙中山并非只是通过协助林圭参与汉口的活动，而是将汉口活动视为兴中会、兴汉会正式活动的一部分。孙中山这时期对长江流域的重视，还表现在他派史坚如与武汉会党联络一事上。林圭抵达汉口后，毕、容二人给予他资金上的援助，并协助他与会党联系、寻找聚会场所等。1900年1月27日，林圭给当时在香港的容星桥写信，就是想通过容星桥请孙中山参加汉口举事<sup>③</sup>。信中还提到，若要知道汉口的秘密聚会处，可向《汉报》查问，这可能与尤列在《汉报》工作有关。

上海方面，唐才常在1899年12月联合汪康年等支持改革的开明绅士和会党人士组成正气会，1900年4月排除汪康年等人另组自立会，而后又在7月联合汪康年等开中国国会。自立会组织当初便分为“文事”及“武事”两部。井上日记亦言及自立会联络和组织各地的武官与会党人士，明显地以举兵为目的。但是，以上海为本部的自立会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以林圭为中心，以汉口为据点，以哥老会为基础的自立军却是一个连汪康年都不知道的秘密组织。唐才常虽然是自立会及自立军名义上的最高指导者，但他长期驻在上海，实际上指挥自立军的是林圭。毫无疑问，自立会是由唐才常全权支配，但自立军却是一方面通过林圭、唐才常的关系受自立会控制，另一方面，又通过容星桥、毕永年受兴汉会、兴中会的影响。因此，自立军的成员虽都是自立会会员，但自立军却非自立会所能独立支配的军事组织。1900年，孙中山和康梁都有计划在两广及长江流域起义，而长江流域的起义，双方都是通过参加及支持自立军

<sup>①</sup> “三愚物”为白岩、荒井、宫坂。

<sup>②</sup> <sup>③</sup> 《自立会史料集》，第322、321—323页。



而进行的，这是前述孙与梁联合的方式。8月22日梁启超在上海曾对井上明言：“两广的举事，现在没有和孙文合同，但将来必要合同”<sup>①</sup>。当时汉口事发的详情及唐才常的生死情况仍未传抵上海，但梁心目中的两广起义方式明显是自立军采取的联合方式。

唐才常在8月9日离开上海赴汉口时，兴中会的王质甫和他同行。王质甫是兴中会早期会员，曾参加1895年起义。1898年1月因获悉孙中山在日本而渡日。唐才常与王质甫同时出发，表示唐才常了解而且同意与兴中会的联合。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之所以离开上海，一说是因为一直给予他保护的上海英领事在汉口事发后要求他离沪<sup>②</sup>。如前所述，容闳和唐、梁的关系，使他知道保皇会的起义计划，在上海参与唐才常的活动又使他了解正气会及后来自立会的成立经过。换言之，容闳通过保皇会及唐才常参与了自立军的起义计划。但从汉口逃脱的容星桥首先联络的是容闳，则表明他们二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容闳亦有通过容星桥参与自立军起义计划的可能性。谢纘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之1900年8月26日记载：“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大通及汉口组织的革命运动未获成功，容闳、星桥与这次运动有关，他们幸得死里逃生”<sup>③</sup>。汉口事发后4日在香港写的这段文字，说明谢早已知道容闳和容星桥一道参加了这次运动。容闳本人也在长崎发表谈话，说自己远在上海参加了汉口起义的谋反计划，事败后既担心危险，又要商讨今后方策，所以与星桥及孙中山同渡日本<sup>④</sup>。这是容闳通过容星桥参与自立军起义的又一证明。

关于容闳在长崎的行动，外务省史料馆所藏的各县知事给外务大臣的秘密报告中  
有记录。在容闳抵长崎的同一天，两个名叫高打（又名高特）及高德的青年乘法国船抵长崎。容闳预先知道他们的到来，送信到船上邀他们来旅馆相会。高打抵日后立刻送了一封只有数字的秘密电报到上海<sup>⑤</sup>。9月4日，容闳接受九州日之出新闻社员的访问，他批评英政府对清国的态度不明朗。同日晚10时，他收到一封从上海来的暗号电报。9月5日及6日，他为了购物及购船票各出外一次，7日早上6时30分，乘船离开长崎前往香港。高打及高德则于6日乘英国船往神户。高姓二人在神户访问同文学校的教员何擎一并与其密谈，兵库县因而推断他们属康派<sup>⑥</sup>。另有崔贞樵（又名崔星朝）和高姓二人同时抵日，他们三人一同从神户乘火车到横滨后投宿于清议报馆。9月13日高姓二人和万木草堂出身的罗孝高等三人到日光旅行。而崔贞樵则对人称他来日的目的是奉本国革新派领袖之命，要在日本筹备军资及观察居留日本的革新派的意见与动向。崔于9月18日前往香港，高姓二人于10月15日从长崎返回上海。但高德于

① 《井上雅二日记》，第170—171页。

② ③ 《支那之部》明治33年9月7日长崎县知事发，高秘第336、329号。

④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311页。

⑤ 《支那之部》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知事发，高秘第329号。

⑥ 《支那之部》明治33年9月10日兵库县知事发，兵发秘第530号。

19日再度和井上雅二一同乘西京丸号轮回到长崎。高打则和尤列同船于10月31日在神户上陆，11月2日高打和一名据称是胞弟的高贵湖及另一人投宿于清议报馆，之后又访问了东京的大同中学。到此为止日本各县的秘密报告还未搞清楚高德及高打的真正身分，直到1901年3月15日的报告，才知道高打原来就是唐才常的胞弟唐才质<sup>①</sup>。至于高德的真正身分，始终未能从报告中发现，但如作大胆的推断，他很有可能是唐才常前往汉口之后辅助唐才质指挥后方，而一向和井上雅二关系良好的狄平。无论如何，容闳抵长崎后之所以和孙中山及容星桥分道而行，是因为他要等待上海来的唐才常一派的联络。这又说明闳虽然可能只是有名无实的中国国会会长，和汪康年等传统绅士也不和，但他的确参与了唐才常一派在上海的活动。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收到暗号电报后去香港，尔后，容星桥亦前往香港。此外，虽然不清楚准确日期，梁启超在离上海之后也是去了香港，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梁启超曾对井上明白表示“两广的举事……将来必要合同”，很明显，汉口事败后的下一个各派联合的舞台是两广。事实上，1900年11月东亚同文会澳门特派员松冈好一的报告便提及，惠州起义前后孙派仍想利用康党的财力，频频前往知新报催促康党“合同”而被拒，孙派因此怨恨康党的无情<sup>②</sup>。这充分证明自立军事败后孙、康的联合仍在继续。

## 五、改革派的联合

本论文没有采用“革命派”、“立宪派”等名称，而是把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容闳、唐才常、林圭、容星桥等一律称之为“改革派”。这是因为在分析1900年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历史过程中，采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二分法并不能够说明当时的状况。抵抗西洋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保存中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是当时参与自立军起义运动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知识分子的各派系中间当然存在对立及矛盾，但他们能够超越对立矛盾而联合进行自立军的起义计划，是因为他们怀着“改革中国”这样一个共同目标。改革各派的联合，如同孙中山、唐才常所说，是“殊途同归”。

对把日本明治维新视为中国改革模范的唐才常来说，把明治维新的“尊皇”和“倒幕”的关系置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勤王”和“排满”也就不会是互相矛盾的。唐才常既想利用保皇会的财力，亦想得到孙中山的协助，若孙、康基本立场上的对立不能解决，就唯有放弃积极合作（同一手段同一目标），而采取“殊途同归”的方式。

<sup>①</sup> 《支那之部》明治34年3月15日兵库县知事发，兵发秘第159号。

<sup>②</sup> 《东亚同文会第十二回报告》，第17页。

梁启超的看法与此类似。“排满”是推翻倒行逆施的清政府，“勤王”是推举光绪作总统实行民政，他认为这样的方法可以被各派接受。

林圭在汉口的一次聚会中曾经说：“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sup>①</sup>林圭的立场是不谈“排满”、“勤王”等主义主张，重要的是实现改革的目标，而方法是造反。

康有为及孙中山的思想处于两个极端，他们把勤王与排满对立，但不排除与其他也是以改革中国为目标的派系的联合。康对孙个人有反感，但同意与孙中山以外的兴中会员（例如谢纘泰、杨衢云）合作，最后终于默认是次联合。孙中山则一面坚持排满一面采取灵活的战略，康有为的名气与财力，以及梁启超、唐才常的“借勤王以兴民政”论是他同意这次联合的要因。

对容闳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1900年4月容闳在香港与谢纘泰密谈时，赞成谢“在能干的基督徒领导下而联合与合作”的主张<sup>②</sup>。容闳、谢纘泰、容星桥等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社会感到亲近，也从基督徒的立场考虑社会变革，但是当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和瓜分的危机时，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高昂沸腾。他们也都是中国改革的提倡者和实行者。由于他们最重视改革这个目的的达成，因而积极寻求和其他派别的联合。谢纘泰一贯批评孙中山“轻率”、“大炮”，但仍然加入兴中会就是一个证明。容星桥以孙中山代表身分在汉口参加自立军起义。容闳在整个自立军起义过程和康梁派、孙派、以及唐才常派都保持密切关系，即使自立军失败后，仍然和孙、康双方保持来往。康有为派他从事和英、美、日的交涉；孙中山则在新政府案中推举他为外国派遣特使。容闳、容星桥及谢纘泰所采取的形式和方法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赞同并且实行联合。

直到1900年左右，中国国内仍未曾出现“革命派”“立宪派”的区分。对体制不满，认为非改革不足以救中国的人都是改革派。改革派中人，可能提倡反清、反满、反政府却不一定赞同革命；而赞成“勤王”者，却又未必亲满或是否定革命。在整个革命运动史上这是很短的期间，但改革派人士曾经排除对立和纷争，而采取联合的方法拯救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责任编辑：徐思彦）

〔作者容应黄，女，1948年生，日本亚细亚大学教养部助教授。〕

① 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第101页。

②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308页。